区域实践

云南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经济脆弱性城乡特征比较分析

廖乐焕，张鹏举，汪精华

（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昆明 650504）

摘要：基于云南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城乡家庭入户调查数据，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模型，从财务边际与偿付能力双维度测度并比较城乡家庭经济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帮扶县家庭普遍面临财务压力，乡村家庭现金流缺口更大、抗风险能力更弱，高风险型家庭占比显著高于城镇；收入不足与支出压力是驱动脆弱性的首要因素，流动资产匮乏与劳动力健康恶化进一步加剧风险，教育水平提升则具有缓冲作用。建议以增收控支为核心，辅以资产建设、健康保障与人力资本积累，构建城乡差异化的防返贫监测与分类帮扶机制，为乡村振兴阶段重点帮扶县政策优化提供实证支撑。

关键词：县域家庭经济脆弱性；HEV 模型；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6－0138－09

2021 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基础上，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相关部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确定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实施意见》，构建覆盖产业、人才、财政、金融、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的系统性倾斜帮扶政策体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公布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的通知》，明确各地综合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核心量化指标，统筹脱贫摘帽时序与区域性返贫风险，在西部地区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中共云南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意见》强调，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云南省作为国家重点帮扶县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尽管全省贫困县已全部脱贫，但受地理区位、自然条件、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制约，其县域经济脆弱性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在城乡差距较大、产业分化明显的县域中，城镇家庭与乡村家庭在收入稳定性、资产结构、消费水平与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县域经济脆弱性，准确识别风险来源与传导机制，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题。

从理论上看，经济脆弱性反映了经济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的敏感程度及内部修复能力，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学界对宏观经济波动、金融体系风险及区域不平衡发展进行了大量探讨，但县域层面特别是家庭经济脆弱性仍研究不足。县域经济既是国家宏观战略的执行单元，又是农村经济活动的基础单元。

收稿日期：2026-04-08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ZX2024YB44)

作者简介：廖乐焕(1975—)，男，江西赣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金融创新；通信作者张鹏举(2001—)，男，云南昭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学；汪精华(2000—)，男，云南镇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学。

研究县域经济脆弱性，不仅有助于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结构，也能为防贫防返贫机制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从实践上看，乡村振兴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后，国家对帮扶县的关注重点逐步从“脱贫指标”转向“发展质量”，其核心在于提升经济韧性与风险抵御能力。然而，许多重点帮扶县的经济结构仍处于“低收入、低产业支撑、低社会保障”的脆弱状态。尤其是家庭层面的财务压力、流动性风险及收入波动，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对重点帮扶县经济脆弱性的系统分析，不仅能识别影响县域稳定发展的“短板”，还能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

本文以云南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家庭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测度模型（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HEV 模型），综合分析城镇与乡村家庭的经济风险差异与结构特征。通过计算财务边际（financial margin，FM）与偿付能力（capacity to finance，CF）指标，定量刻画家庭的短期流动性风险与抗冲击能力，并通过城乡比较、聚类分析与回归检验，揭示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差异性、影响因素及生成机制。

本文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论方面，从微观家庭视角切入县域经济风险研究，构建了基于家庭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 HEV 模型，丰富了经济脆弱性测度的分析工具；实证方面，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形成可量化、可比较的指标体系，为县域经济风险识别提供了微观证据；政策方面，城乡脆弱性差异的识别可为分层分类帮扶政策的制定提供循证依据。

1　文献综述

“经济脆弱性”概念最初形成于自然科学与灾害风险研究领域，用于刻画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的敏感性与恢复能力。进入经济学研究后，学者逐渐将脆弱性框架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对不可预测冲击的暴露程度与应对能力。Ligon 和 Schechter[1] 提出的脆弱性测度方法被视为经济脆弱性定量研究的奠基性成果，他们将脆弱性界定为“未来福利低于某一阈值的概率”，并提出可操作的实证测度模型，为日后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一研究使脆弱性从定性描述转向基于福利与风险评估的定量建模，强化了学界对“收入冲击-风险暴露-福利损失”链条的认识。

在宏观冲击与群体脆弱性的研究中，Glewwe 和 Hall[2] 的实证研究基于秘鲁面板数据，首次系统检验不同人群在宏观经济冲击下的福利下降差异，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非农收入较稳定的家庭对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更低。此类研究强调结构性差异对脆弱性的影响，为“县域-城乡-家庭”分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在区域与农村发展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入到家庭层面。Dercon[3] 利用埃塞俄比亚农村面板数据，发现外部冲击不仅影响短期消费，还会对家庭资产积累、收入结构与长期发展路径造成持续性侵蚀。其结论揭示了“脆弱性-长期贫困陷阱”的机制，为理解脱贫地区返贫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微观家庭研究方面，Kochar[4] 的实证分析明确指出教育、人力资本、收入结构和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家庭在面对收入波动和支出冲击时的应对能力；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能够更有效地通过劳动力再配置、调整消费与社会网络互助等方式缓冲冲击。该研究强化了对家庭层面“脆弱性异质性”的认识，也为本文选取教育、收入、健康等指标作为影响因素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撑。

国内在经济脆弱性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推进，特别是针对贫困县和农村家庭的脆弱性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脆弱性，探讨了区域经济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5]；第二阶段转向县域层面，研究了贫困县在自然灾害、基础设施不足等背景下的脆弱性；第三阶段，随着微观数据的逐步积累，学者开始聚焦家庭层面的脆弱性，尤其是收入波动、负债水平与社会保障对家庭经济安全的影响[6]。具体而言，李波和朱太辉[7] 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的债务水平对经济脆弱性的显著影响，表明负债越高，家庭面临的金融脆弱性风险也越大；岳崴等[8] 重点讨论了健康风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对家庭脆弱性的缓解作用，证明了健康因素是农村家庭脆弱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姚健等[9] 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分析了家庭如何利用亲属支持、社会保障等方式降低脆弱性，并提出数字金融和金融素养能有效提升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总体来看，国际研究提供了成熟的脆弱性测度方法[1]、群体差异识别路径[2] 及家庭冲击响应机制[3-4]；国内研究强调中国式经济结构与县域发展模式下的脆弱性特征。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①研究尺度偏宏观或偏散点微观，缺乏“县域-城乡-家庭”三级联动的整体研究视角；②缺

乏能够准确刻画家庭经济韧性与资产负债结构的针对性模型，难以识别县域中高风险群体；③微观数据不足，多依赖统计年鉴，难以揭示返贫风险的真实形成机制。理论模型的本土化适配不足。尽管 Ligon 和 Schechter[1] 提供了经典测度范式，但其对福利损失的定义多依赖于完善的市场数据。在中国西部重点帮扶县，家庭资产形态特殊（如耕地、宅基地虽估值高但变现难）、非正规金融依赖度高，直接套用国际模型易产生偏差。本文选取的 FM 与 CF 指标组合，聚焦于家庭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即期状态，避开了对农村资产价格波动的复杂模拟，更契合“防止规模性返贫”这一政策目标下的即期风险筛查需求。这种基于财务稳健性视角的 HEV 模型构建，是对现有以消费波动为主的脆弱性测度体系在县域应用层面的理论简化与改进。

因此，本文基于重点帮扶县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借鉴国际成熟测度方法，构建适合县域情境的 HEV 指标体系，并系统比较城乡差异，以弥补现有研究在理论框架、测度工具与微观证据上的不足。

本文以云南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研究对象，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分析框架，其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维度。

（1）研究样本兼具典型性与政策代表性。贾晋和高远卓[10] 指出县域经济面临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多维度差异。云南作为全国重点帮扶县数量最多的省份，既是脱贫攻坚阶段的主战场，也是当前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核心区域。该省县域经济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具有显著的“高原山地-民族边疆”叠加特征，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产业基础薄弱、家庭收入波动较大。李中建和王志华[11] 的测度显示，中国城市经济韧性整体高于县域经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虽有一定韧性基础，但城乡差距问题依然突出。选取云南样本展开分析，不仅能够有效捕捉欠发达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共性逻辑，也可为全国同类重点帮扶县的分类治理提供可比照的经验证据。

（2）研究内容在县域与家庭双层级间建立了系统关联。本文既不同于仅关注宏观区域指标的脆弱性评价，也有别于孤立讨论家庭消费波动的微观研究，而是将宏观城乡结构与微观家庭财务特征纳入统一框架。通过引入家庭经济脆弱性模型，利用一手入户调查数据测算财务边际与偿付能力两项核心指标，前者识别家庭短期流动性缺口，后者衡量其应对冲击的持续性，从而在县域层面实现脆弱性的定量分层与城乡异质性刻画。这一设计弥补了既有研究“宏微脱节”的不足，为理解脆弱性在城乡之间的传导与集聚机制提供了分析基础。

（3）研究方法强调指标组合的情境化适配与多维实证检验。在借鉴经典脆弱性测度范式的基础上，针对重点帮扶县资产形态特殊、市场发育不足的特点，聚焦家庭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即期状态，以财务边际与偿付能力的组合分层替代传统的消费平滑测度，构建适用于欠发达县域的脆弱性分类准则。在实证策略上，综合运用聚类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及有序 Logistic 回归等方法，对城乡家庭脆弱性分布、组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递进检验，从量化层面回应了以往研究重定性描述、轻统计推断的局限。

（4）理论模型的边际贡献在于城乡比较维度的嵌入与风险分层功能的验证。现有家庭脆弱性文献多以单一城乡样本展开，缺乏对二元结构内部韧性差异的统一测度。本文将财务边际与偿付能力整合为有序分类变量，通过大样本数据验证了其在区分“流动性危机”与“长期偿付危机”方面的有效性，为防返贫监测提供了较单纯收入标准更具前瞻性的分层工具。

2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2.1 HEV 模型构建与计算方法

家庭经济脆弱性是家庭内部结构特征与外部风险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家庭经济风险的累积程度及其抗风险能力。前者体现家庭财务状况的稳健性，后者反映其在遭受经济冲击时维持正常生活的能力。

在指标构建上，分别采用财务边际（FM）衡量家庭的风险积累程度，以偿付能力（CF）刻画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前者基于家庭收入与支出差额反映流动性缺口，后者通过家庭当期收入与流动性资产的综合状况，衡量其在维持既有生活水平条件下可持续的时间长度。

财务边际反映家庭短期流动性风险状况，可理解为家庭现金流缺口。其定义为家庭总可支配收入减去基本生活支出与分期负债支出的净额，即

$$FM = Y - LC \tag{1}$$

式中：FM 为家庭财务边际；Y 为家庭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业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政府转移性收入；LC 为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与负债之和。基本生活支出涵盖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交通

通信及医疗保健等八类支出[12];负债包括经营借款、住房贷款、车辆贷款、教育借款、医疗借款、金融投资借款及信用卡债务等。

当FM≥0时,表明家庭当期收入能够覆盖基本支出及负债,流动性风险较低;当FM<0时,家庭存在现金流缺口,表明短期流动性风险上升。若家庭可通过动用流动性资产(如预防性储蓄、可变现股票或债券等)抵御现金流缺口,则财务压力相对可控;反之,若流动性资产不足以弥补差额,则家庭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

偿付能力衡量家庭在遭受经济冲击时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持续性,是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体现。该指标定义为家庭流动性资产与当期可支配收入之和相对于家庭总支出的比值,即:

$$CF=(Y+LA)/LC \tag{2}$$

式中:CF为家庭偿付能力;Y为家庭可支配收入;LC为家庭基本生活支出及负债(定义FM公式);LA为家庭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基金、股票及债券等可快速变现的金融资产。CF越大,说明家庭可依靠当期收入与流动性资产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时间越长,抗风险能力越强;反之,CF越低,则家庭在面对突发支出或收入波动时更易陷入经济困境。

综合考虑家庭短期现金流缺口与风险应对能力,在财务边际(FM)与偿付能力(CF)的基础上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HEV)指标,用以表征家庭整体经济风险水平。通过FM与CF的组合,可在家庭层面上识别短期流动性风险与长期偿付能力,从而建立统一的经济脆弱性测度体系。HEV为有序分类变量,具体判定标准如表1所示。

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赋值

为准确评估家庭经济脆弱性水平,在构建HEV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问卷数据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处理与计算。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城乡家庭入户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人口特征、收入来源、支出结构、资产负债、保险参与及健康状况等方面。共回收城镇样本407份,乡村样本1 045份。在数据清洗过程中,剔除缺失值比例较高和逻辑不一致的样本,最终获得城乡有效样本共1 283份,其中城镇样本355份,乡村样本928份。

表1 HEV家庭经济脆弱性判定

HEV取值	经济状态判定	判定条件	经济含义说明
HEV=−1	无经济脆弱性	FM≥0	家庭收入足以覆盖支出和负债,财务状况稳健
HEV=0	低经济脆弱性	FM<0且1≤CF<1+LA/LC	收入不足以覆盖支出,但流动性资产可部分缓冲风险
HEV=1	高经济脆弱性	FM<0且CF<1	收入与流动性资产均不足以应对支出,经济风险显著

在变量赋值方面,对问卷中的选项型变量进行了系统编码。对于单选题中反映程度或满意度的变量,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赋值法,依次赋值为1~5。在实证研究中,对有序分类变量进行区间取值是通行的处理方法。参考村落调查研究数据库(CRSS)对收入分组数据的编码实践[13],将问卷中的经济变量选项视为分组数据,取其区间中值进行数值化转换。

具体而言,城镇问卷的选项区间设置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分组方法[14]。选项1对应(0,5)万元,选项2对应[5,10)万元,选项3对应[10,20)万元,选项4对应[20,30)万元,选项5对应[30,40)万元,各组中值分别取2.5万、7.5万、15万、25万、35万元。

乡村问卷的选项区间则依据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实际分布进行调整。考虑到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收入分布普遍存在左偏、整体水平较低的结构性特征,且云南省作为重点帮扶县集中区域,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450元)[15],直接套用城镇标准将导致测量误差较大。为此,本文在参考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组标准差异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省重点帮扶县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实际,将乡村问卷的收入、支出等区间阈值整体下移,设置为:选项1对应[0,1)万元,选项2对应[1,1.5)万元,选项3对应[1.5,2.5)万元,选项4对应[2.5,3.5)万元,选项5对应[3.5,6.5)万元,各组中值分别取0.5万、1.25万、2万、3万、5万元。上述城乡区间设置的差异,旨在更精确地捕捉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收入分布左偏、城镇家庭收入分层更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而提高变量测量的区域适配性与数据精度。

对于二元变量,采用虚拟变量赋值,即“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对于连续变量,根据实际数据区间取中值进行数值化处理,并按统一单位(万元)进行调整。以此为基础,通过SPSS对样本进行标准化处理、聚类分析及回归检验。

3　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分析

3.1　城镇家庭经济特征描述

城镇家庭收入与资产状况如表 2 所示。年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 8.35 万元，中位数为 7.5 万元，标准差为 5.80，工资性收入占主导但家庭间存在分化。年均基本生活支出均值为 7.69 万元，与工资性收入中位数持平，收支紧平衡特征明显。现金与存款均值为 9.54 万元，中位数为 7.5 万元，储蓄水平较高但分布不均。投资性资产中位数及百分位数均为 0，金融投资参与度低。借款负债均值为 3.73 万元，中位数为 0，多数家庭无负债。城镇家庭收入与储蓄能力相对稳健，但存在收入分层与资产配置单一问题。

表 2　城镇家庭收入特征描述

变量	样本	中位数	众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年均工资性收入	355	7.5	7.5	8.35	5.80
年均其他收入	355	2.5	2.5	6.29	6.01
年均基本生活支出	355	7.5	2.5	7.69	6.50
年均教育/医疗/文娱支出	355	7.5	7.5	6.69	4.75
借款负债总额	355	0	0	3.73	6.12
现金与存款总额	355	7.5	2.5	9.54	8.06
投资性资产	355	0	0	1.02	3.67

3.2　乡村家庭经济特征描述

乡村家庭收入与资产状况如表 3 所示。家庭年均总收入均值为 4.52 万元，中位数为 3.5 万元，标准差为 3.81，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镇。年均基本生活支出均值为 2.20 万元，占总收入比例约为 49%，支出压力较大。现金与存款均值仅为 0.76 万元，中位数为 0.5 万元，约为城镇水平的 1/12，流动性资产匮乏。借款负债均值为 0.03 万元，绝大多数家庭无正规借贷。耕地面积均值为 1.46 亩（1 亩≈666.67 m^2），农业生产规模小。乡村家庭呈现收入低、储蓄薄、资产变现难的特征，抗风险能力明显弱于城镇家庭。

3.3　城乡 FM 与 CF 比较描述

如表 4 所示，城镇家庭的平均财务边际（FM）为 −1.797，标准差为 0.098；而乡村家庭 FM 均值为 −3.934，标准差为 0.048。负值表明两类家庭均存在现金流缺口，但乡村家庭的缺口明显更大，说明其短期财务风险显著高于城镇家庭。

在偿付能力（CF）方面，城镇家庭均值为 1.377，高于乡村家庭的 1.182，显示城镇家庭凭借收入与流动资产可支撑日常生活更长时间。综合来看，城镇家庭的短期流动性风险较低，抗冲击能力更强；

表 3　乡村家庭人口与收入特征描述

变量	样本量	中位数	众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家庭年均总收入	928	3.5	3.5	4.52	3.81
年均基本生活支出	928	2	2	2.20	1.54
年均教育/医疗/文娱支出	928	1.25	1.25	1.43	1.15
借款负债总额负债	928	0	0	0.03	0.07
现金与存款总额	928	0.5	0.5	0.76	1.36
家庭耕地面积	928	0.625	0.625	1.46	1.22

表 4　城乡家庭 FM 与 CF 描述统计结果

指标类型	群体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现金流缺口（FM）	城镇	355	−11.00	4.00	−1.797	0.098
	乡村	928	−10.00	0.00	−3.934	0.048
家庭偿付能力（CF）	城镇	355	0.36	3.25	1.377	0.027
	乡村	928	0.36	3.00	1.182	0.013

而乡村家庭在应对突发支出或收入中断时更易陷入经济困境。

3.4　城乡家庭经济脆弱性聚类结果

如表 5 所示，可将样本分为稳健型、中等型与高风险型三类。城镇样本中，稳健型家庭占比为 20.8%，中等型占 61.4%，高风险型仅为 17.7%；而乡村家庭稳健型占 21.2%，中等型占 50.1%，高风险型比例高达 28.7%。

聚类结果显示，城镇家庭整体经济结构更趋稳健，而乡村家庭内部的高风险群体比例较大。这与其收入来源单一、社会保障薄弱密切相关。FM 与 CF 均值在稳健型中呈正值，而高风险型则明显为负，进一步验证了 HEV 模型在区分不同家庭经济状态上的有效性。城乡差异主要体现为城镇家庭的“韧性优势”与乡村家庭的“脆弱集中”。

4　城乡经济脆弱性比较分析

4.1　独立样本 *T* 检验

表 6 反映了城乡家庭在财务边际和偿付能力上的显著差异。莱文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FM、CF 两组城乡方差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采用 Welch 校正独立样本 T 检验开展组间差异分析。由表 6 可知，城乡在 FM、CF 指标上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效应量结果显示，FM 指标城乡差异为

表 5　城乡家庭经济脆弱性聚类结果

群体	聚类类型	FM	CF	聚类个案数	占该群体样本比例/%
城镇	高风险型	−1.525	−1.246	63	17.7
	稳健型	1.138	1.508	74	20.8
	中等型	0.054	−0.151	218	61.4
乡村	高风险型	−1.224	−0.874	266	28.7
	稳健型	1.052	1.456	197	21.2
	中等型	0.254	−0.116	465	50.1

强效应，CF 指标城乡差异为中等效应，说明城乡群体在两类指标上存在实质性分化，且 FM 维度城乡差距远大于 CF 维度。

这说明城镇家庭的财务状况更健康，现金流与资产结构更合理，而乡村家庭则更容易受到收入不稳定或突发支出冲击。总体上，城乡家庭的经济韧性存在系统性差距，反映县域经济发展中“城强乡弱”的特征。

4.2 HEV 比例及卡方检验

城乡家庭经济脆弱性在分布上存在结构性不均衡，城镇以稳健型为主，而乡村高风险型集中，具有明显的社会空间特征。如表 7 所示，无脆弱性家庭在城镇占 17.5%，乡村仅 0.2%；低脆弱性家庭在乡村占比为 74.2%，略高于城镇（67.9%）；而高脆弱性家庭在乡村占比为 25.5%，显著高于城镇的 14.6%。卡方检验（$\chi^2=168.11$，$P<0.001$）说明城乡 HEV 分布差异具有极强统计意义。

进一步看，城镇家庭占无脆弱性群体的 96.9%，而乡村家庭占高脆弱性群体的 82%，显示出经济风险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此差异反映出城镇家庭拥有更多经济缓冲机制（如稳定就业、保险与储蓄），而乡村家庭仍处于脆弱性高发区。

4.3 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为识别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以 HEV 有序分类变量（无脆弱性＝－1，低脆弱性＝0，高脆弱性＝1）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户主年龄、外出务工情况、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家庭支出及流动资产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模型拟合如表 8 所示，最终模型的-2 对数似然值为 582.744，较仅截距模型下降 1 252.478（$P<0.001$），说明解释变量的引入显著提升了模型解释力。伪 R^2 指标中，考克斯-斯奈尔 R^2 为 0.623，内戈尔科 R^2 为 0.818，麦克法登 R^2 为 0.679，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表 9 回归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流动资产及家庭支出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显著影响（$P<0.01$），户主年龄与外出务工情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各显著变量的经济含义阐释如下。

（1）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255（$P=0.005$），优势比为 0.775。户主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等级，家庭落入更高脆弱性等级的风险降低 22.5%。这一结果表明，教育通过提升劳动力市场参与能力与信息获取效率，增强了家庭应对收入冲击的缓冲空间，与 Kochar 关于教育降低脆弱性的结论一致。

（2）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康状况的系数为 0.827（$P<0.001$），优势比为 2.286。因该变量赋值为“越差取值越大”，正向系数表明主要劳动力健康每恶化一个等级，家庭脆弱性升高的风险增加约 128.6%。在欠发达县域，家庭收入高度依赖劳动力投入，健康受损直接缩减劳动力供给并增加医疗

表 6 FM 与 CF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比较

变量	均值差值	校正 t 值	校正自由度 df	P	Cohen's d	差异程度
FM	－2.137	－19.686	530.155	＜0.001	－1.365	强效应
CF	－0.195	－6.615	522.638	＜0.001	－0.463	中等效应

注：莱文方差齐性检验显示 FM（$F=12.793$，$P<0.001$）、CF（$F=24.291$，$P<0.001$）两组方差不齐，采用 Welch 校正独立样本 T 检验；均值差值＝乡村均值－城镇均值；Cohen's d 判定标准：$|d|<0.2$ 微弱效应，$0.2\leqslant|d|<0.5$ 中等效应，$|d|\geqslant0.8$ 强效应。

表 8 Logistic 模型拟合效果

分析维度	具体指标	关键统计值	显著性
模型拟合信息	仅截距模型-2 对数似然	1 835.222	—
	最终模型-2 对数似然	582.744	＜0.001
	似然比检验（卡方/自由度）	1 252.478/7	—
拟合优度	皮尔逊（卡方/自由度）	3 337.938/1 701	＜0.001
模型解释力（伪 R^2）	考克斯-斯奈尔伪 R^2	0.623	—
	内戈尔科伪 R^2	0.818	—
	麦克法登伪 R^2	0.679	—

表 7 城乡家庭 HEV 比例及卡方检验结果

维度	经济脆弱性	城镇家庭（样本量＝355）	乡村家庭（样本量＝928）	总计（样本量＝1 283）	统计结论
HEV 分布比例	无脆弱性	62 户（17.5%）	2 户（0.2%）	64 户（5.0%）	城镇无脆弱性比例远高于乡村
	低脆弱性	241 户（67.9%）	689 户（74.2%）	930 户（72.5%）	乡村低脆弱性占比略高于城镇
	高脆弱性	52 户（14.6%）	237 户（25.5%）	289 户（22.5%）	乡村高脆弱性比例显著高于城镇
交叉分布特征	无脆弱性占比	96.9%（占总无脆弱性户）	3.1%（占总无脆弱性户）	—	无脆弱性家庭以城镇为主
	高脆弱性占比	18.0%（占总高脆弱性户）	82.0%（占总高脆弱性户）	—	高脆弱性家庭以乡村为主
卡方检验结果	皮尔逊卡方值	168.110	自由度＝2	＜0.001	城乡 HEV 分布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
	似然比卡方值	159.026	自由度＝2	＜0.001	进一步验证差异显著性
	线性关联卡方值	83.137	自由度＝1	＜0.001	城乡脆弱性等级呈显著线性差异

表 9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OR 值	95%置信区间
户主年龄	1 283	−0.082	0.171	0.633	0.921	[−0.418,0.254]
外出务工情况	1 283	−0.051	0.144	0.722	0.950	[−0.333,0.230]
户主受教育程度	1 283	−0.255	0.091	0.005	0.775	[−0.432,−0.077]
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康状况	1 283	0.827	0.248	<0.001	2.286	[0.342,1.313]
家庭年收入	1 283	−2.427	0.167	<0.001	0.088	[−2.753,−2.100]
流动资产	1 283	−1.591	0.135	<0.001	0.203	[−1.855,−1.327]
家庭支出	1 283	2.843	0.178	<0.001	17.167	[2.494,3.192]

注：被解释变量为 HEV 等级（−1＝无脆弱性，0＝低脆弱性，1＝高脆弱性），以“高脆弱性”为参照类别；健康状况变量赋值为“越差取值越大”，家庭年收入、流动资产、家庭支出均为连续型正向变量。

支出，构成脆弱性的重要来源。

（3）家庭年收入的系数为−2.427（P<0.001），优势比为 0.088。家庭年收入每增加一万元，脆弱性升高的风险降低约 91.2%，系所有变量中效应量最大的保护因素。收入作为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直接物质基础，其稳定增长能够有效填补财务边际缺口并提升偿付能力。

（4）流动资产的系数为−1.591（P<0.001），优势比为 0.203。家庭流动资产每增加一万元，脆弱性升高的风险降低约 79.7%。在重点帮扶县，实物资产变现困难，流动性资产是应对突发冲击最直接的资金缓冲，其积累厚度直接决定家庭抗风险能力。

（5）家庭支出的系数为 2.843（P<0.001），优势比为 17.167。家庭支出每增加一万元，脆弱性升高的风险增加约 16.17 倍。该变量的正向系数表明，在收入增长乏力的条件下，刚性生活支出与债务性支出的叠加将显著加剧家庭财务压力。乡村家庭虽绝对支出水平较低，但支出收入比更高，支出压力更为突出，这一结果与李波和朱太辉关于债务杠杆推升脆弱性的研究相互印证。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云南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家庭经济脆弱性模型，从财务边际与偿付能力两个维度，对城乡家庭经济脆弱性进行了定量测度与比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县域家庭普遍面临财务压力，城乡抗风险能力差距显著。城镇与乡村家庭均存在现金流缺口，但乡村家庭的缺口规模更大、偿付能力更弱，在面对收入中断或突发支出时更易陷入经济困境。独立样本 T 检验进一步确认了城乡家庭在 FM 与 CF 指标上的系统性差异。乡村家庭高风险型占比显著高于城镇，其根源在于收入水平偏低、流动资产匮乏、健康风险暴露更高，且支出压力相对收入而言更为沉重，反映出县域经济发展中“城强乡弱”的基本格局。

（2）乡村家庭高风险集聚特征明显，城乡脆弱性结构分化突出。聚类分析显示，城镇家庭以稳健型和中等型为主，高风险型占比较低；乡村家庭中高风险型比例接近三成，且几乎不存在无脆弱性家庭。这表明乡村家庭在收入稳定性、资产积累与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结构性短板，是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点关注群体。

（3）收入、支出、流动资产、健康与教育共同构成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与流动资产的积累能够显著抑制脆弱性风险，而支出规模的扩张与主要劳动力健康恶化则显著推升脆弱性水平，户主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对降低脆弱性具有积极作用。从效应强度来看，家庭支出规模与家庭年收入是影响脆弱性最强的两个因素，流动资产与健康状况次之。上述因素的系统性差异，解释了聚类分析中乡村高风险型家庭高度集中、城乡脆弱性结构分化的现象。

（4）城乡脆弱性差异的根源在于资源禀赋与风险暴露的结构性错配。乡村家庭收入水平偏低且波动性大，流动资产持有量普遍匮乏，健康风险敞口更高，而城镇家庭在收入来源多样性、金融资产积累与社会保障覆盖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一结构性差异为差异化帮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5.2　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针对重点帮扶县城乡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结构性差异与核心影响因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多渠道促进家庭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论表明，收入不足是驱动家庭脆弱性的首要因素，且乡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镇。建议在乡村地区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与乡村旅游等富民产业，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户稳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在城镇地区着力稳定就业基本盘，扶持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发展，拓展工资性收入增长空间；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职业培训与就业对接服务力度，此外，政府补贴能够通过提升家庭未来信心与互联网使用意愿显著抑制财务脆弱性[16]，在乡村地区效果尤为突出，提升其劳动力市场参与能力。邵文波等[17]表明，收入来源多样化能够显著降低城乡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2)合理调控家庭支出压力，防范刚性支出与债务风险叠加。结论表明，支出压力是推升脆弱性的关键风险因素，且乡村家庭支出收入比偏高的问题更为突出。建议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制度，扩大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切实降低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规范县域消费信贷市场秩序，加强对家庭过度负债的监测与预警，防止债务风险向返贫风险转化；在教育领域，提高对重点帮扶县学生的资助精准度与覆盖面，减轻家庭教育支出的刚性负担。

(3)引导家庭流动性资产积累，增强应急缓冲能力。结论表明，流动性资产匮乏是乡村家庭高风险性集中的重要原因，而城镇家庭在流动资产持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建议在乡村地区大力推进普惠金融下沉，推广小额储蓄激励政策，鼓励家庭形成预防性储蓄习惯；优化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布局，提升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便利性；探索村级互助资金或社区应急基金等非正式金融安排，弥补正规金融在偏远地区的服务空白，为家庭应对突发冲击提供即时资金支持。马晓杰等[18]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提升数字化参与度可有效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为重点帮扶县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经验支撑。

(4)强化主要劳动力健康保障，阻断“因病致贫”传导链条。结论表明，主要劳动力健康状况恶化显著加剧家庭脆弱性风险。建议在重点帮扶县优先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升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首诊服务能力，减少因外出就医产生的额外经济负担；针对农村主要劳动力群体开展定期健康体检与慢性病筛查，建立健康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的长效机制；扩大医疗救助与临时救助的覆盖范围，确保因病陷入困境的家庭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兜底保障。杨丹等[19]对易返贫致贫人口的识别分析也印证了健康与教育因素在防返贫监测中的关键作用。

(5)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夯实家庭长期韧性基础。结论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经济脆弱性呈显著负相关，教育是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的根本性因素。建议持续改善重点帮扶县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与师资配置，保障乡村儿童接受公平优质教育的权利；面向成年劳动力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与学历提升计划，增强其就业适应能力与职业发展空间；对脱贫家庭子女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给予专项资助，阻断脆弱性在代际间的传递。

(6)建立城乡差异化的防返贫监测与分类帮扶机制。城乡家庭在经济脆弱性的类型与程度上存在结构性差异，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帮扶策略。建议以财务边际与偿付能力为核心指标，构建覆盖城乡家庭的动态监测台账，实现风险等级的定期评估与分类标识。对乡村高脆弱性家庭，优先实施收入兜底、医疗救助与资产建设相结合的综合性干预；对乡村低脆弱性家庭，重点通过就业扶持与小额信贷巩固其经济韧性，防止滑入高风险区间；对城镇稳健型家庭，引导其参与创业投资与产业升级，发挥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策，推动防返贫工作从“事后救助”向“事前预防”转型。刘卫平等[20]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研究证实，防止返贫帮扶政策能够显著增强县域经济韧性，对中西部地区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

参考文献

[1] LIGON E, SCHECHTER L.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3, 113: C95-C102.

[2] GLEWWE P, HALL G. Are some groups more vulnerable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than others? hypothesis test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Peru[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6(1): 181-206.

[3] DERCON S. Growth andshocks: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M]. London: Routledge, 2004.

[4] KOCHAR A. Explain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idiosyncratic incomeshock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2): 159-164.

[5] 冯振环，赵国杰. 区域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及其评价体系研究——兼论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5(10)：56-59.

[6] 臧旭恒，项泽兵.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测度研究——基于经济脆弱性的视角[J]. 南方经济，2023(12)：1-18.

[7] 李波，朱太辉.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J]. 金融研究，2022(3)：20-40.

[8] 岳崴，王雄，张强. 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J]. 中国工业经济，2021(10)：175-192.

[9] 姚健，臧旭恒，周博文. 社会网络与中国家庭金融脆弱性

[J]. 金融研究，2024(4)：151-168.
[10] 贾晋，高远卓.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困囿、逻辑转置与未来进路[J]. 社会科学研究，2025(3)：1-13.
[11] 李中建，王志华. 我国县域经济韧性的实践检验[J]. 中国流通经济，2024，38(4)：90-101.
[12] 岳希明，胡一凡，李禛临. 社会政策体系中的基本生活需要：内涵与测量[J]. 经济学动态，2023(4)：42-58.
[13] 岳经纶.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政策创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14] 国家统计局.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城镇家庭收入分组方法[EB/OL]. (2013-01-01)[2026-04-01].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12/html/2b10.htm.
[15]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2024年云南省居民收支稳步增长 消费需求有效释放[EB/OL]. (2025-01-21)[2026-04-01]. https://ynzd.stats.gov.cn.
[16] 卢亚娟，杨怡. 政府补贴如何抑制家庭的财务脆弱性？[J]. 金融理论探索，2024(2)：32-40.
[17] 邵文波，李秦，任桂. 收入来源差异化与贫困脆弱性：基于城乡家庭的对比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25(11)：86-100.
[18] 马晓杰，李耀龙，刘红. 数字化参与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分析[J]. 台湾农业探索，2025(1)：14-24.
[19] 杨丹，朱珠，刘生龙. 共同富裕目标下易返贫致贫人口的识别分解与特征分析——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方法[J]. 学习与实践，2024(9)：95-108.
[20] 刘卫平，周文义，谢俊明. 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9(4)：46-57.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 National Key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LIAO Lehuan, ZHANG Pengju, WANG Ji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national key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a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HEV)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economic vulner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margin and repayment capac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households in the assisted counties generally face financial pressure, with rural households experiencing larger cash flow gaps, weaker shock resilience, an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of high-risk households compared with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Income insufficiency and expenditure pressure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of vulnerability, while liquidity shortages and deteriorating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labor force further exacerbate the risk;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y contrast, serves as a buffer. It is suggested that policy efforts should center on income growth and expenditure control, supplemented by asset building, health security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differentiated urban-rural monitoring and classified assistance mechanism for preventing the recurrence of poverty. Empirical support is provided for policy optimization in key revitalization counties dur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age.

Keywords: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HEV model; urban-rural differences